

引用格式：郑平熹. 网络哀悼中数字身份的多方构建——基于扎根分析研究 [J]. 华人生死学, DOI: 10.12209/j.hrssx.XXXXXXXX01.

华人生死学 >>>>>>>>

CHINESE LIFE AND DEATH STUDIES

死亡文化



# 网络哀悼中数字身份的多方构建——基于扎根分析研究

郑平熹

**摘要：**网络媒介的可供性促使用户在互联网中留下大量数字痕迹。在用户的主动行为下，这些数字痕迹聚合形成了其在网络空间的数字身份，体现了“自我”对“化身”的控制权。然而，当数字身份的主体性缺失时，其形象建构便不再由“自我”主导。故此，于主体缺位情境下逝者数字身份的建构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深度访谈结合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网络哀悼的传播过程本身即逝者数字化身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这一过程受到四类主体力量的协同推动：媒介呈现作为哀悼的初始催化剂，激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讨论；随后，网友参与、亲属介入以及逝者既往的数字自我展示共同发挥作用，他们不仅促进了网络哀悼的广泛传播，更塑造了关于逝者数字身份的社会共识。

责任编辑：雷蕾

收稿日期：2025-07-29

接受日期：2025-09-22

发表日期：2025-09-29

**关键词：**网络哀悼；数字身份；数字痕迹；自我呈现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志码：R

文章编号：2957-370X (XXXX) XX-0001-16

## 一、引言

在网络哀悼的新语境下，由于社交界限的模糊性，公众能够直接访问逝者生前的数字痕迹，进而感知并构建其对逝者的整体认知。这一过程不仅依赖于社会关系提供的信息，还融合了多元视角的参与，极大地丰富了逝者在网络空间中的形象展现。我们注意到，公众在参与网络哀悼时，会通过自发性的评论与创作活动，进一步充实和深化逝者的数字形象。

尽管众多研究已从“媒介可供性”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变革对哀悼活动转型的影响，但在网络哀悼的具体情境下直接审视逝者数字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重大意义。逝者的数字身份不仅具有数字存在的物质价值，更蕴含深远的精神内涵，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这既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议题，也涉及社会伦理的考量。基于此，本文旨在深入研究网络哀悼中数字身份构建与传播的复杂机制，通过梳理网络哀悼的传播主体和传播过程，试图回答：参与网络哀悼的主体都有哪些？他们在网络哀悼中产生了怎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对逝者的形象产生了怎样影响？是如何影响社会对逝者形象的广泛认知的？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数字身份：虚拟社会中的永恒形象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中留下大量的数字痕迹，这些数字痕迹包括电子邮件、个人文档和相册、社交媒体账号及相关内容、软件和网页的浏览使用记录等，<sup>[1]</sup> 这些数字痕迹的总和共同组成了一个人在网络中的数字身份，进而被社会所感知。

数字身份是数字技术与虚拟环境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代表了个体在数字世界中的虚拟存在。对于数字身份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数字身份是由用户控制的、具有拟人化形象、能够在数字世界中实现化身-环境、化身-化身互动的用户个体的数字化代表。<sup>[2]</sup> “数字化身”的认知是主体跨越生命介质的嵌套，其认知效果的实现要通过个体才能完成，个体必须以自己作为实践中心，才能完成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人和物的互渗式认知实践。<sup>[3]</sup> 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主身”与“化身”之间的考量，认为“化身”的构建须依托于“主身”，主要指涉生者的行为对数字化身的构建，忽略了数字化身作为网络数据具有开放性。用户在活着时制作个人资料来代表他们的身份，但这些数字身份在主体死后仍然存在，随着朋友向死者的个人资料添加内容，并将他们与图像、标签和 SNS 活动的证据编织到他们的社交网络中，这些身份也会增长。<sup>[4]</sup> 所以在网络哀悼语境下，把数字化身作为数字遗产的一部分，其建构的主体就不仅仅依赖于“主身”而存在了。

作为数字身份的个人网络痕迹在互联网上的持久保存，不仅为哀悼行为拓展了新的边界，还促使哀悼实践跨越了传统物理空间与仪式的框架限制。John Durham Peters 在《对空言说》中写道：“由于媒介可以储存‘生者的幻象’，因此，即便人的肉体死亡，它也可以让逝者音容宛在。”<sup>[5]</sup> 已故个体的数字身份，借由虚拟数字人的技术媒介，正逐步显现出实现“分身有术”与“灵魂不朽”潜能的“万物互联新时代之新生命体”。此现象标志着个体身体得以跨越至虚实交融的多元维度，而精神或曰“灵魂”则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存续。<sup>[6]</sup> 通过精心构建数字身份或虚拟人物，我们得以在元宇宙及其他数字疆域内，开创性地实现与逝者的模拟互动，营造出一种“仿佛他们仍旧活在当下”的错觉。这一过程不仅拓宽了人类记忆与哀思的载体边界，也深刻反映了技术进步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我们对生命、死亡及存在本质的理解与体验。<sup>[7]</sup> 数字身份不仅为在世之人开辟了一条与亡故者保持精神联结的新路径，而且为逝者构筑了一种超越肉体消亡的新型“存在”模式。借由持久的信息存储机制与单方面的互动方式，它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数字化的“不朽”状态<sup>[8]</sup>。

在此过程中，数字身份的持续更新与迭代，不仅塑造出了一种持久的社会认知形象，还逐渐成为公众认知的主要渠道与依据。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深刻地颠覆了传统身份构建的既有框架，而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记忆载体”，凭借技术与话语的双重赋权机制，赋予了哀悼者能力，使他们得以解构以及重新协商由“主我”概念所引领的数字身份。数字身份的流动性特质，允许身份信息在网络空间内被不断地补充与丰富，这一现象深刻地揭示了在网络哀悼语境下，数字身份构建过程的复杂性与高度动态性。在此背景下，对逝者数字身份建构流程的深入探讨，不仅能够有效弥补当前在逝者



形象研究领域的不足，还为探讨网络中主体性弱化现象下的形象构建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

## （二）情感联结：网络哀悼中的形象感知

形象感知是一个多维度且高度复杂的心理过程，它涉及多种因素的相互交织与影响。根据《Toward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Face Impressions》的研究成果，对他人的形象认知建立在三大变异性来源的相互作用之上：目标对象的特征、感知主体的特性，以及这两者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sup>[9]</sup>这一发现揭示了我们的感知并非仅仅基于他人固有的属性，而是同样受到我们自身特性以及我们与对方互动模式的深刻影响。在网络哀悼的语境下，公众对逝者形象的认知同样呈现出非单一、非纯粹的特性。这是因为逝者的数字化形象是在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共同塑造的，且这一过程伴随着其他网络活动的并行发展。其中，情感劳动构成了网络哀悼活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在网络哀悼的情境中，形象感知与情感活动紧密相连，二者相辅相成。

网络哀悼搭建了一个情感表达与管理的平台，这一平台在特定情境下能够有效地缓解人们的悲伤与孤独感。Raun T的研究表明，利用如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哀悼亲近之人的离世，有助于人们释放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忽视或压抑的情感。<sup>[10]</sup>在表达情感的过程中，对亲近之人的怀念实际上是对其在世形象的一种碎片化补充与重构。然而，社交媒体上的哀悼也可能引发情感的过度披露，这类过度表达有时可能被视为侵犯隐私或过于亲密的行为。Natalie P指出，网络哀悼可能使悲伤情绪更为公开化，从而加剧个体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缺乏适当社会支持的情况下。<sup>[11]</sup>因此，网络哀悼对个人及集体情感健康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提供了情感表达的渠道，有助于人们释放情感；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情感过度暴露和社会关系紧张，甚至可能侵犯逝者信息的隐私边界，改变其在世时的形象，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舆论讨论，导致形象崩塌。

在情感抒发的过程中，平台进一步赋予哀悼者权利，通过对逝者相关记忆的记录与呈现，深化了对逝者形象的回溯与认知。此类情感表达行为借助网络平台快速聚焦公众视线，在短时间内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塑造共同的形象认知。<sup>[12]</sup>例如，林宇阳、邹振东通过对袁隆平网络哀悼现象的研究发现，社会公众与媒体通过共同议题与文本生产，不仅表达了对袁隆平的哀思与敬意，还构建了新的文化身份及民族、国家认同。<sup>[13]</sup>这表明网络哀悼在塑造集体记忆与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Giaxoglou K与Doeveling K的研究则聚焦于粉丝与名人间的哀悼互动，深度剖析了社交媒体上的名人哀悼仪式。他们以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这一领域的动态变化与深入探究的价值。<sup>[14]</sup>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情感媒介化实践如何微妙地影响名人形象的塑造。国内学者许莹琪与董晨宇则通过系统分析，揭示了影响哀悼真诚表达的关键因素——“边界感知”及哀悼者的社会身份。<sup>[15]</sup>由于数字身份的存在特性使得网络哀悼中的哀悼者能与逝者建立单向情感联系，即自我表达、社交互动与生死对话。<sup>[16]</sup>这种联系随着网络情感的波动而不断变化，最终深化了哀悼者对逝者形象的回忆与认知。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本文关注普通意义上的逝者的数字身份的建构。在网络哀悼语境下，本文将数字身份建构视作多方合力的结果，而非“自我”单方塑造的，而且逝者的数字身份建构是伴随着情



感劳作展开的。通过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揭示逝者形象的多主体性及其在构建逝者形象时产生的效力。为超越单一案例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访谈广泛收集普通网民对网络哀悼活动的观察视角、参与经历及深刻感悟，进而提炼并抽象出网络哀悼中数字身份在普遍意义上的建构与传播模式以及范畴界定。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定性研究范式，其可追溯至社会学家巴尼·格拉泽与安塞尔·施特劳斯的开创性工作。该方法独树一帜地强调了数据收集、深度分析及理论构建三者间循环往复、相互促进的迭代过程，倡导一种基于实证数据而非预设理论框架的探究路径，它摒弃了从既有理论出发推导可验证假设的传统做法，转而直接扎根于实际观察与深度访谈的肥沃土壤，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细致入微地剖析研究现象，逐步揭露其内在的形成逻辑与运作机制。

由于本研究是采用访谈的方式开展，通过访谈内容进行扎根可以保证访谈内容得到提炼，增加文章的阐释力度和解释范围，最大程度上保证研究的合理性。本研究运用扎根研究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深度访谈获取文本资料，访谈时灵活地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与受访者一同深入探索了网络哀悼形象这一领域的个人经历与感受。然后结合扎根理论的研究从原始数据中逐步提炼理论，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逐步揭示了隐藏于数据背后的规律与模式。进而构建了一个与网络哀悼中身份构建相关的理论模型。

#### （二）对象选取

本文的研究焦点集中在网络哀悼活动的观察者、积极参与者以及信息接收者三大主体上。依据既有研究成果发现，相较于80后与90后，70后在互联网信息检索及社会交往活动中的参与度展现出了相对弱势。这一差异可归因于80后及90后群体较早地接触并融入了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环境<sup>[17]</sup>，从而更倾向于利用这些平台来进行哀悼表达与社交互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指出生于1995–2010期间的网生代）作为与互联网普及同步成长的一代，其文化特性与社交模式深受互联网影响，自幼便习惯于在网络上抒发情感<sup>[18]</sup>，所以18至35岁的中青年群体成为网络哀悼活动的核心参与者。

访谈初期，采用了大规模开放性抽样的方法，并随后通过滚雪球抽样策略进一步细化样本，以确保访谈对象的多样性和代表性。访谈采用半结构化形式，旨在通过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全面且客观地揭示网络哀悼的传播机制及数字身份构建的动态演变趋势。在数据处理与结果展示阶段，对所有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实施了严格的匿名处理。具体操作上，采用“N”作为匿名标识的前缀，后跟随数字序列进行顺序编码。（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概览请参见表1）

#### （三）资料收集与处理

在严格遵守伦理原则，确保获得受访者明确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研究对每一次访谈过程都进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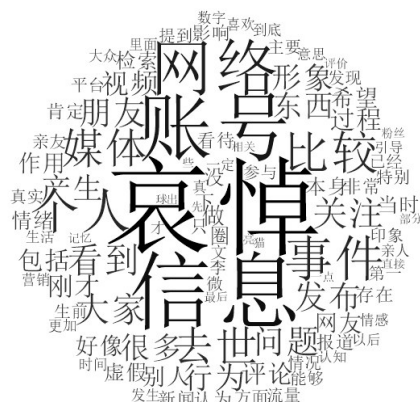


表1 受访者基本材料

受访者	年龄	性别	职业
N01	25	女	小学老师
N02	21	女	大学生
N03	26	女	大学老师
N04	34	女	助理经理
N05	19	男	大学生
N06	24	女	大学生
N07	24	男	研究生
N08	28	男	律师
N09	27	女	新媒体运营
N10	25	女	自由职业
N11	22	女	大学生
N12	28	男	脱口秀演员
N13	23	男	高中老师
N14	32	男	项目经理
N15	28	男	自由职业
N16	24	男	公职人员
N17	26	男	实习生
N18	24	女	插画师
N19	18	女	高中生
N20	27	男	工程师

全面而详细的录音记录。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被精心规划，控制在40至60分钟之间。研究共收集了20份访谈资料。其中，15份资料被用于后续的编码分析，以提炼关键信息和构建理论框架；剩余的5份则作为饱和度检验的样本，用于验证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饱和度。

鉴于该目标群体的内在复杂性与所用平台的广泛多样性，本研究未将样本代表性作为首要选取准则，而是通过运用扎根研究方法将焦点置于数据是否能够实现理论饱和度这一核心目标上。使用质性研究分析工具Nvivo15，以系统化地整理与分析访谈资料，并实施了多轮迭代式的检验性编码流程。在进行编码前对访谈资料进行词频查询，在剔除无关词汇后，得到的高频词汇云如图1所示，字号越大，代表提及的次数越多。从图中可以看出，整体深度访谈主要围绕着关于“哀悼”“网络”“媒体”“账号”“信息”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知，本访谈着眼于哀悼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以及相对影响因素的讨论。



#### (四) 数据分析

本研究通过反复细读与网络哀悼相关的访谈记录，利用Nvivo15这一专业分析工具，系统地导入访谈文本资料。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的迭代与归纳，对文本中的有效句子及段落进行精确标记，创建出一系列具体的分析节点。随后，通过对标记节点的系统梳理，识别出彼此间存在的相似性和关联性，进而实施更高层次的归纳与分类操作。最终，经过这一系列缜密的编码与分析流程，本研究成功归纳出18个初级概念（见表2）。

子范畴	原始资料(节选)
报道伤痕人生	N02:去抓住逝者的一些什么悲惨生活,或者是他的一些不好的经历去突出报道。 N05:媒体报道的倾向,也会是报道他生命中的伤痕,而不再是他生命中的快乐。
故事情节渲染	N09:我支持媒体去深度报道去挖掘他们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不能理解情绪化的带动和故事化的编造。 N05:在他死亡的时候,报道就会变成一个充满艺术叙事的事情。
碎片内容呈现	N01:就是在平台上面刷哀悼信息,但我感觉信息还不是很全。 N13:我所获得的信息大部分其实都是碎片化的信息,不是那种整体的就是。
平台数据推送	N01:是我刷抖音或者我刷微博刷小红书的时候刷到,就参与了。 N06:算法推荐到了,也可能会认真去看一下。
网络热搜推荐	N02:微博上也会有一些热搜,因为我感觉这种事件一般都会就是比较引起一些关注。 N06:比如在那个热搜上面刷到了,可能就会想点进去发表评论。
网络哀悼感悟	N06:如果有意义的话,可以是一个纪念账号。但比如说公开的账号,自媒体账号,我如果我有一个公众号,我有一个公开的抖音,它变成一个纪念账号是有意义的,因为里面有作品。
网友哀悼评论	N13:网友的评论就是确实它是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但是这个评论就是有正面的引导,也有反方向的一个引导问题,但是就是正是由于网友评论就是很辩证看待吧。
个人主动检索	N01:比如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这个歌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然后我就去搜了这个人,然后我就知道了她是什么。 N5:我会去检索一下他的,可以通过他的账号了解,人物生平他在他身上发生的那些故事和他的一些成就之类的。



续表

子范畴	原始资料(节选)
网友社交扩散	N03:Host family聊到这个类事件了,然后后面才去了解更多信息。 N07:发朋友圈的形式那我们,我可能更多的。看到那些哀悼的事情视频然后去点个赞、评论。
网友单向解码	N06:是他如果留下一些作品,或者他的个人信息,在这个社会上还依旧可以跟人产生这种互动的话,虽然是单向的互动了,但这个人还是像存活一样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亲友哀思表达	N04:比如说是主要是一些比如说逝者的一些亲人朋友发布的一些东西,他们也会在哀悼,也是出于哀悼的目的,或者怀念的目的。
亲友观点输出	N01:博主Birdy也是自杀的,然后就有很多他的朋友给他发声惋惜,好像是一个学校的男生,然后他。他是因为性取向的问题,自杀了,他的父母也在网络上进行发声,想要知道他自杀的真相吧。
补充逝者信息	N10:我会把他的亲朋好友,包括如果是个单位的别人对他们的那些采访评价,我都会去全部看清楚,就是想了解一下他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丰满逝者形象	N02:因为当时他们的一些朋友也在抖音上发视频,然后你也会看到他们一些朋友就是还有他们的一些,你可能就会让感觉就是会有一种他们一些鲜活的那种性格形象就是都会从一些视频中能看出来。
个人账号引导	N03:我可能会根据他最近发的几次的内容判断他是个怎样的人。他最近发的几次内容可能跟他的死亡原因有关,或者说都是比较积极向上的话。我会默认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会有更多的那种情绪上的触动。
个人形象呈现	N02:那个邓妈妈就是他是自己本人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虽然他只是面临的她本人没有去世,但是她可能就是得了这个疾病,去发这个系列抖音就为她的亲人留下一些什么。
接近真实自我	N06:看到他的这个账号里面发表的一些视频什么的,会对他人产生一个更全面的认知吧。 N14:看她的个人账号我觉得我会更深层次地去了解一下这个人其实。 N10:个人账号只是他自己呈现的可能是一方面,不代表全部。
展现片面自我	N03:账号只是一部分,有更多元的展示的可能性的,可以有。照片有视频,有音频。有文字的什么都可以。

## 2. 主轴式编码

通过对开放式编码所得出的18个子范畴进行深入剖析与比较,最后系统地将其整合提炼为8个主轴编码(见表3)。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断验证并调整各范畴间的相互关系,以确保逻辑的一致性与准确性,最终标志着主轴编码工作的圆满完成。

##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编码是一个严谨的分析过程,它涉及在已发掘的全部概念类属中,通过系统化的审视与剖析,甄别并选定一个“核心类属”,进一步阐明主要范畴间的内在联系至关重要。<sup>[19]</sup>本阶段将本项理论建构的核心任务确定为“网络哀悼中数字身份的生成机制与传播流程”(见图2),并构建出对这一过程做出解释的理论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验证阶段发现某些概念或范畴的归类不够精确,会回溯至开放性编码阶段,再对概念或范畴进行细致的复审与必要的调整,最终确定的四个核心范畴依(详细参见表4)。

## 4. 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特选取预留的5份访谈资料,旨在进行理论饱和度的验证。通过对这五份访谈文本进行独立的深度编码处理,并将其结果与原有编码数据集进行细致的比对分析。校对发现,所有新涌现的概



表3 访谈主轴编码表

主范畴	子范畴	范畴内涵
死亡叙事	报道伤痕人生 故事情节渲染 碎片内容呈现	在报道过程中报道更注重逝者生前经历的不公,通过碎片化、故事化的处理,引起网友的关注,最终引发集体性网络哀悼。
媒介推送	平台数据推送 网络热搜推荐	死亡事件出现后并非第一时间就进入大众视野是由平台推送和网络热搜造成的。
单向哀悼阐释	网络哀悼感悟 网友哀悼评论	在网络哀悼过程中,网友会通过评价表达个人观点,通过感悟表达自身思考。
社交媒体扩散	个人主动检索 社交扩散悲伤 网友单向解码	在哀悼事件引发关注后,网友主要采取的行动有三种,个人搜索更多信息进行了解,在社交平台分享,基于获得信息进行解读。
联结自我	亲友哀思表达 亲友观点输出	网络哀悼的大规模产生说明事件具有一定特性,亲友通过表达哀思输出个人观点。
亲密见证	补充逝者信息 丰满逝者形象	亲友发表的观点和看法可以补充逝者的生前信息使得逝者形象更加立体。
账号表达	个人账号引导 个人形象呈现	逝者留存的个人账号通过其生前选择性呈现来引导大众对其的感知。
自我账号	接近真实自我 展现片面自我	逝者的个人账号是最真实的自我变大,但是由于具有选择性也是片面的。

表4 访谈核心编码表

理论情景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关系内涵
网络哀悼	媒体呈现	媒介推送	媒体呈现→数字身份
		死亡叙事	
	网友介入	社交媒体扩散	网友介入→数字身份
		单向哀悼阐释	
	亲缘准入	亲密见证	亲缘准入→数字身份
		联结自我	
	自我呈现	自我账号	自我呈现→数字身份
		账号表达	

念均可被既有的编码概念及范畴所充分涵盖。此外，各类别之间并未揭示出新的逻辑关联或因果关系，亦未发现任何全新的概念。据此，可以确信本研究的编码过程展现了高度的严谨性，并且已经成功达到了理论饱和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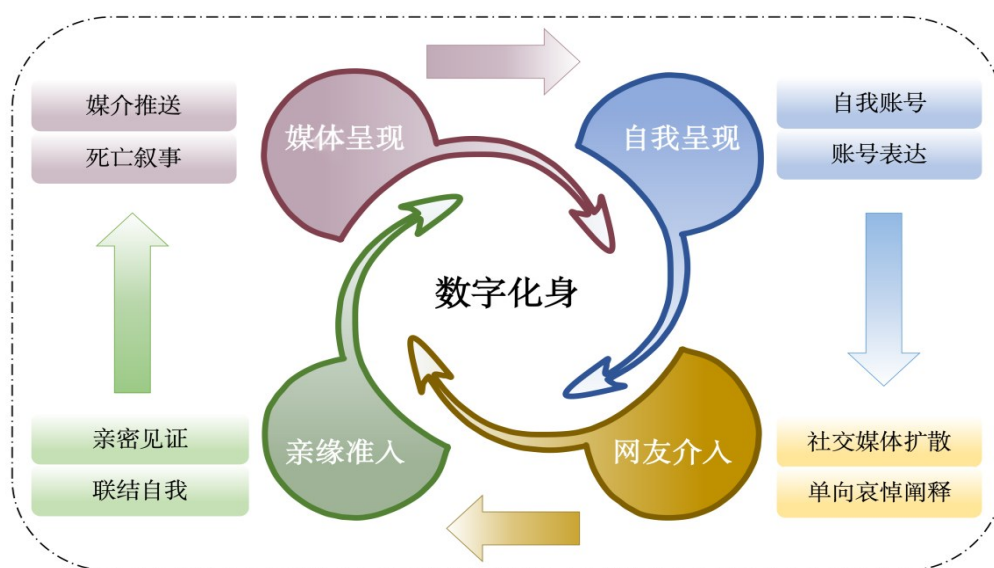


图2 网络哀悼中数字身份的生成机制

## 四、模型阐释

### （一）媒体呈现：聚合关注造就数字身份

#### 1. 媒体推送：死亡议题热度升高

社交媒体的“连接可供性”激活了公众之间的纽带，实现了解放个人与集体想象力的表达和信息共享，促进了“情动公众”（affective publics）的形成。<sup>[20]</sup> 首先，算法倾向于放大情绪化内容，尤其是表达愤怒和对外群体敌意的推文。这种算法偏好的结果是，用户在平台上看到的内容更加极端和情绪化，从而可能加剧了悲伤情绪的传播。<sup>[21]</sup> 平台推送机制下死亡话题的广泛扩散构成了一个多维度且错综复杂的现象，其背后交织着多重层面的动力因素。从信息传播主体的视角剖析，社交平台上信息的流通主要由三大用户群体驱动：其一为大众媒体（涵盖传统媒体及其在社交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其二为草根用户（即普通民众），其三为意见领袖（包括知名人士及网络上的影响力人物）。<sup>[22]</sup>

在这之中，大众媒体在传播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话题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意见领袖则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将信息传播的网络延伸至核心圈层之外，触及更广泛的公众。“因为我用短视频平台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的。发酵到一定程度的那种，就是会引起一定的热度的，抖音平台上的新闻开始推送，包括一些平台上有个人转发，营销号，还有一些官方账号在报道这一类的信息，关注到这些死亡信息或者网络哀悼。”（受访者N10）这表明，在平台生态系统中，信息主体在构建与死亡相关的话题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主导作用。相较于其他话题，死亡议题似乎更能触动网民的情感共鸣与深切关注。

#### 2. 死亡叙事：塑造苦难人生偏向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受访者通过媒介认知逝者数字形象的时候更偏向于跟一些悲痛的事件联系起



来，这导致广大网友在参与网络哀悼时对逝者主体认知产生某种倾向。“有一个演员好像叫马修斯，然后说他其实比较抑郁，但是在哀悼这样一个比较悲伤的环境中的时候，他的一些负面的经历是更容易被提及的，我就从我朋友圈里的帖子，然后加上媒体报道的倾向，更多的是报道他生命中的伤痕，而不再是他生命中的快乐。”（受访者N05）

另外，在死亡议题的报道中，媒介化的苦难不仅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还通过各种媒介手段（如抖动的镜头、倾斜的视角等）增强了现实感，使公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苦难的存在。关于苦难媒介化感知的研究表明，通过媒介传播的苦难信息能够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和认知参与。<sup>[23]</sup>“我感觉就是对事件就是第一印象，其实挺重要的。有一些新闻去抓住可能他的一些什么悲惨生活，或者是他的一些什么其他不好的，就是去说然后你可能会让你一下子就是记住这个事，之后就会去搜更多信息，增加我的一些对这种死亡或者不幸的一些感触。”（受访者N02）由此可见，新闻报道中的苦难往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而苦难叙事更能直接激发公众对远方苦难的同情，表现为谴责、慈悲、感同身受以及无力感等多种形式。<sup>[24]</sup>借助于苦难叙事的手法结合媒介技术本身的特性，促进了情感认同的深化与对逝者数字身份认知的某种偏向。

## （二）自我呈现：网络展演自塑数字身份

### 1. 自我账号：数字身份的直接显化

在个体已然离世的情况下，通过其个人账号中的自我书写来探究其生平，不失为一种最为便捷且直接的途径。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在网络上更为真实地表达自我的行为，往往与更良好的社会联系及较低的心理压力水平相关联。<sup>[25]</sup>鉴于网络环境主要构成弱连接，用户在此类平台上往往能更加无畏地展现真实的自我。“我觉得看一些他生前发的一些东西对他有。会增进真实感，我觉得是比较真实的他本人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会更加增加这个对逝者的了解的真实性的。”（受访者N04）

此外，一系列研究成果揭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我呈现与个人人格特质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显著关联。<sup>[26]</sup>用户通过自传式的叙述及与他人的日常互动，共同勾勒出了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现实我”画卷，这无疑是个体真实自我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的生动映照。<sup>[27]</sup>例如，李文亮医生，其微博内容便透露出他在日常生活中对追剧和篮球比赛的热爱；再如COCO李玟，尽管其微博中不乏公告类信息，但同样穿插着生活化的点滴，如吃喝玩乐等细节。“我觉得个人账号我觉得更偏向于一种平凡更接近生活，近距离让我去观看，了解了一下他的一个生活是这样子。”（受访者N05）这些在网络上遗留的数字足迹，虽源自个体生活的局部片段，却也是真实生活状态在网络空间中的映射，构成了一种虽片面却较为贴近真实的自我呈现。事实证明，在世时，人们越参与网络世界的互动，去世后数字身份的潜在影响力就越大。

### 2. 账号表达：数字身份的选择呈现

数字身份作为一种数字遗产，它们不仅反映了逝者希望留下的印象，也为生者提供了通过数字身份缅怀逝者的途径。<sup>[28]</sup>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数字遗产被视为一种新型媒介形式，它重构了



用户生前逝后的媒介实践，使得年轻一代更愿意对自己的数字遗产进行生前管理<sup>[29]</sup>，这一现象在病患社群、互助小组等特定群体中尤为显著。<sup>[30]</sup>这种管理不仅包括情感媒介、表演媒介与记忆媒介的功能，还影响了生者与逝者的数字交往。

其中抖音博主“邓静妈妈”就是一个癌症患者进行媒介书写的典型案例。一开始她希望利用平台记录自己，给自己的亲人和孩子留下美好的回忆。但是随着账号的不断更新，“邓静妈妈”的账号获得了网友的大量关注，其点赞量和粉丝量直线上升，随后央视《相对论》栏目采访了邓静，抖音出品的综艺《我爱我很棒旅行日记》也邀请邓静参加节目录制。“那个邓静妈妈就是她是自己本人做账号，虽然她只是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她知道得了这个疾病可能并非那么好治愈，有所触动，去发这个系列。还有可能就是她去发的这些东西，记录美好的生活想给在世者留下美好的回忆。”（受访者N02）

在此，我们洞察到自我呈现过程中，选择性展示对于个人形象构建的深远影响与强大效能，互联网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在个体寻求认同和支持的心理机制中扮演了复杂而多面的角色，这些平台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开化的环境，使得处于生死边缘的个体能够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感受，从而获得社会支持和认同<sup>[31]</sup>。

### （三）亲缘准入：直接旁观佐证数字身份

#### 1. 亲密见证：身份塑造的助力

失去亲人的人们得以通过公开分享个人的悲伤与创伤故事、交换信息与情感支持资源，共同分担死亡带来的沉重经历<sup>[32]</sup>，作为死亡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者，亲属间的情感纽带在哀悼过程中显得尤为坚韧且难以割舍，同时也对整体的网络哀悼氛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亲缘关系在网络哀悼中的话语构建，往往是最接近“逝者体验”的，具有极高的情感共鸣与感染力。

“亲友发布逝者信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比如说胖猫事件，本来就闹得沸沸扬扬的，然后他的姐姐出来发了很多的视频关于胖猫和这个事儿，当时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受访者N06）经过对海量网络哀悼案例的细致剖析，我们得以明确洞察到，除“胖猫事件”凸显了亲友群体的强大导向作用外，还存在诸多类似现象。例如当歌手“COCO李玟”逝世时，其姐姐通过微博平台发表深情悼词，表达哀痛之情。此外，诸如抖音平台上的博主“Birdy”以及被誉为“少年英雄的眉山小伙李政”等人物去世后，他们的亲友也利用社交媒体发布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填补了我们对逝者未知领域的空白，而且有力地构建了逝者的数字化形象与网络记忆，为信息的进一步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补充。

“因为这些亲友不太可能作秀，那可能就是对他本人真实的展现，包括可能他的亲朋好友，他们就是更有代表性吧。（受访者N02）”在此过程中，亲密关系者的信息发布往往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与代表性，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逝者内在的感受与情感。这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哀悼行为，不仅体现了亲密关系者对逝者的深厚情感，也为我们理解逝者在数字世界中的存在与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2. 联结自我：增强哀悼在场感

从学术观察的角度细分，旁观者角色可进一步区分为直接旁观者与间接旁观者两大类。间接旁观者，特指那些通过电子屏幕远距离观测事件的人群，由于物理距离的隔绝，他们无法亲身体验事件现场。直接旁观者在信息传递链中占据首要位置，因未经中间环节过滤，通常被视为更具真实性。<sup>[33]</sup>在此背景下，亲友发布的信息则被视为直接的情感体验。

“亲人在网络中发布的信息让我觉得更能体验到同理心，亲友在网络中发布其感受，真的很触动我，因为我身边也有亲朋好友，所以就会联想很多，体会到作为亲友那种不舍与悲伤的情感，到一个同理心的感觉。”（受访者N11）例如抖音平台上的博主“小锐Zz”通过短视频，以一种深情而独特的方式悼念其已故好友，视频发布收获了高达674.5万次点赞与307.1万次转发，配以文案“这是一封长长的信，寄给在天堂的你”，在时长为3分26秒的短片中，博主细腻地回顾了与挚友从初识、相知到最终“天人永隔”的整个过程。

表5 热评摘要

热评代表
“你习惯性地镜头偏移，可是她再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你的手机里”
“世界是她的遗书，而你是她的遗物”
“第一次感受到诀别书的杀伤力”
“还好有这么多记录...可是有这么多记录”
“你们有好多视频呀突然发现我们很少视频，照片也寥寥无几，以后真的要好好记录了”

进一步分析网友的评论（参见表5），发现作为旁观者的网友，通过这一短视频直接且深刻地见证了博主与其好友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与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这种“缺席的在场”，即虽然网友并未亲身经历，但通过媒介传播而感受到的强烈情感联结有效地触动了他们的内心<sup>[34]</sup>，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情感共鸣。除此之外，抖音平台上的博主如“毕加索的忧伤”与“依阿ya”，亦通过发布短视频的形式，深切哀悼其已故好友，此举不仅吸引了广泛的公众注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哀悼活动的发起者与被哀悼对象，均非“社会名流”或“平民名人”，却依旧能激发广泛的共鸣，这有力地证明了亲缘叙事在网络哀悼语境下所展现出对逝者的数字身份强大构建能力。

（四）网友介入：全网传播下的丰富数字身份

1. 社交媒体扩散：数字身份的广泛认知

在当前以平台为主导的网络生态中，网民与信息发布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流动且互动的特性，网民不仅可以被动接收信息，亦能主动创造并发布内容，以此阐述个人观点，这一用户与平台间的动态交互对于信息的互补性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sup>[35]</sup>

“现在网络的发达，周围朋友会进行哀悼。就导致我在朋友圈看到了，然后我就去微博上检索了相关的信息，然后发现他去世了，大家立刻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并且大规模地发起了集体性哀悼”





（受访者 N05）在此过程中，网络哀悼所蕴含的悲伤、哀思等复杂情绪，通过用户间的分享与传递，实现了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多级传播，最终汇聚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壮观死亡”<sup>[36]</sup>。此进程不仅见证了网络哀悼信息的广泛传播，还体现了广大网友在逝者信息整合中的积极参与。他们通过发布个人所见所闻，不断为逝者的数字记忆增添新内容，这一过程使得逝者的数字身份得以持续更新与丰富。同时，媒介在呈现这些信息时，也会吸纳并反映网友新产生的观点与态度，从而形成一种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舆论环境。此外，亲缘关系在这一网络舆论场中亦受到影响，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与网络空间中的情感表达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哀悼活动的新形态。

## 2. 单向哀悼阐释：数字身份的单向解码

当一个人离世之后，其符号价值即从个人属性的桎梏中解脱，转化成为一种“开放源代码”，任由那些未曾谋面却心怀哀思的网民们灵活采纳并创造性地运用。<sup>[37]</sup>更进一步，假若逝者的网络账号因其死因触动了某种特定的社会情绪或网民的心理共鸣，就会使得对逝者的悼念超越了私人与小众的界限，转而演变成为一个广泛讨论的社会议题，乃至成为流行的网络标签。

由于逝者的主体性已然缺失，其身份内容的拓展仅能依赖在世者共享的记忆，用户所接触的实则是对逝者的替代性叙述。在此情境下，人们唯有以逝者留存的数字足迹为核心媒介，进而引发持续的讨论与多元阐释。“比如说某个网友发出来的一个与逝者相关视频，可能因为就是他加入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去解读，如果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导致很多人要追随，反正我观察到的特别是在抖音，哀悼某人的时候，有一些文案就是网友写出来的，然后就会大范围传播，很多人就会用相同的悼词去哀悼这个人，在评论区最常见。”（受访者 N15）诸如此类的都是基于网友自我认知对逝者做出的单向解码行为，这种单向的解码机制极大地促进了逝者数字形象的增殖与丰富：生前所构建的个人资料作为身份标识，在逝后依然得以存续；更有甚者，随着友人在其个人资料上的不断追加内容，以及通过图像、标签和社交网络活动将其融入更为广泛的社交脉络之中，这些数字身份得以进一步丰富与扩展。<sup>[38]</sup>

“是他如果留下一些作品，或者他的个人信息，在这个社会上还依旧可以跟人产生这种互动的话，虽然是单向的互动了，但这个人还是像存活一样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受访者 N15）随着时间的推移，网民对逝者的记忆与心理动机也在不断地演变，逝者微博账号下的评论也经历了从最初的悲伤共鸣，到情感倾诉，再到公共领域分享的转变。在这一复杂而交织的过程中，逝者的形象与身份得以重塑与再构，呈现出新的面貌。

## 五、总结与反思

当前，网络哀悼行为的广泛参与正逐步深化公众对数字遗产议题的探讨，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个体数字痕迹在逝世后应保留还是删除的深刻辩论。这一讨论不仅触及逝者隐私与名誉的敏感领域，还对逝者生前关联者的心理与社会影响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旨在深入分析网络哀悼语境下逝者形象的构建机制，通过系统性梳理，提炼出塑造其数字身份的四个核心环节。

这四个核心环节以高度互依的方式紧密关联，其中自我呈现表现为一种单向影响特征，而媒介呈



现、亲缘准入和网友介入则通过动态的相互作用、信息输出与意义整合，共同推动数字身份的构建。

另外，从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延续性视角来看，死亡并非生命意义的终结，而是其自然延续至特定时间段的体现。这一延续性构成了个体生前对生命的感知与期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社会中，数字遗产作为数字身份的留存载体，其性质决定了逝者在身后仍可保有人身专属性。这种专属性在现代社会中主要通过人格权的形式得以体现，数字身份的留存作为数字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承载了个体的传记生命，还彰显了与人格利益相关的独立价值。<sup>[39]</sup> 这些价值是对人之生命整体性理解不可或缺的要害，进一步凸显了数字身份在社会、伦理与法律层面的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陈刚,李沁柯. 穿梭时空的对话:作为媒介“安魂曲”的数字遗产[J]. 新闻记者,2022(11):33.
- [2] 王海忠,李冰莲,谢涛. 数字世界的自我化身理论建构[J]. 管理科学, 2022, 35 (03): 116-130.
- [3] 宋妍,于千惠. 人类学视角下数字化身的“赋神”之路[J]. 文化学刊, 2023, (09): 70-73.
- [4] BRUBAKER J R, HAYES G R, DOURISH P. Beyond the grave: Facebook as a site for the expansion of death and mourning[J]. Information Society, 2013, 29(3): 152-163.
- [5] 彼得斯.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 邓建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208.
- [6] 李怡庆,李卫东. 虚拟数字人:万物互联网的新物种[J]. 融媒, 2024, (04): 17-21.
- [7] 宋美杰,曲美伊. 作为生存媒介的元宇宙:意识上传、身体再造与数字永生[J]. 东南学术, 2023, (03): 206-216.
- [8] SHANI O ,ADGORITHMS. From Science Fiction to Reality: The Evolu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WIRED[J].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titative Biology, 1980(44 Pt 2): 1289-95.
- [9] HEHMAN E ,STOLIER MR ,FREEMAN BJ , etal. Toward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face impressions: What we know, what we do not, and paths forward [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9, 13 (2): n/a-n/a.
- RAUN T . "Talking about his dead child, again! " Emotional self-management in relation to online mourning. [J]. First Monday, 2017, 22 (11).
- [10] NATALIE P . Tie Strength and Time: Mourn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17, 61 (1): 11-23.
- [11] 宋琳琳,孙明宇. “网络仪式”:重大舆情引导的新范式[J]. 新媒体研究, 2021, 7 (04): 5-7.
- [12] 林宇阳,邹振东. “我”和“我们”:社交媒体哀悼空间的共同体形塑——基于“袁隆平逝世”的微博评论文本分析[J]. 新媒体与社会, 2023, (03): 169-186+393.
- [13] GIAXOGLU K. “R. I. P. man... u are missed and loved by many”: entextualising moments of mourning on a facebook rest in peace group site[J]. Thanatos, 2014, 3(1): 10-28.
- [14] 许莹琪,董晨宇. 社交媒体中的哀悼行为与社会规范[J]. 新闻与写作, 2019(11): 49-54.
- MOORE J, MAGEE S, GAMREKLIDZE E, etal. Social media mourning: Using grounded theory to explore how people griev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J]. Omega, 2019, 79(3): 231-259.
- [15] 赵联飞. 70后、80后、90后网络参与行为的代际差异[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02): 65-72.
- [16] 戴仁卿,刘彬. 符号娱乐与圈层文化——“Z世代”网络语言流行现象解读[J].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2, 22 (01): 13-15+25.
- [17]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4), 58-63+73.
- [18] PAPACHARISSI Z.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9] MILLI S, CARROLL M, PANDEY S, et al. Twitter's algorithm: Amplifying anger, animosity,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J]. arxiv preprint arxiv:2305.16941, 2023.
- [20] CHA M, BENEVENUTO F, HADDADI H, et al. The World of Connections and Information Flow in Twitter [J].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ystems, 2012, 42 (4): 991-998.
- [21] 张萌. 苦难的媒介化感知:距离、现实与情感——以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为例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 (04): 43-48.
- [22] 王卿. 苦难表征、媒介代理与公众同情:失独新闻的情感驯化实践 [J]. 新闻知识, 2024, (03): 3-12+93.
- [23] RACHEL G, JARRAH W. Th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Being Authentic on Facebook. [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6, 19 (7): 420-5.
- [24] 张凯亮,臧国全,路杭霖,等. 社交网络用户自我披露水平与其人格特质之间的关联研究 [J]. 现代情报, 2022, 42 (06): 49-56.
- [25] 杨桃莲. 微博空间中“现实自我”的建构 [J]. 新闻记者, 2013, (12): 58-63.
- [26] 周裕琼,张梦园. 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2, 29 (12): 32-52+127.
- [27] 董嘉楠,谢巍. 记忆或遗忘——人们如何处理数字“身后事” [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24, 32 (02): 36-41.
- [28] 陈刚,王卿. “被围观的私语”:癌症经验网络自我叙事的能动性书写、叙事治疗与意义生产 [J]. 学术研究, 2023, (02): 51-57+177-178.
- [29] WIGGINS S, MCQUADE R, RASMUSSEN S. Stepping Back From Crisis Points [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016, 26 (9): 1240-1251.
- [30] 陈旭东,黄藤莉. 保罗·利科论公正的记忆[J]. 浙江学刊, 2024(1): 166-172.
- [31] 高德胜. 电子媒介与“旁观者”的生产——论道德教育在电子媒介时代的选择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7, (04): 30-37.
- [32] 苏涛. 缺席的在场:网络社会运动的时空逻辑 [J]. 当代传播, 2013, (01): 23-26.
- [33] 姚艳虹,刘潇. 平台治理、用户参与和互补者关系的交互作用及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效应 [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 43 (21): 228-237.
- [34] JACOBSEN M H. “Spectacular Death”—Proposing a New Fifth Phase to Philippe Ariès's Admirable History of Death [J]. Humanities, 2016, 5(2): 19.
- [35] 贾祥敏,应慧. 何以为记:微博逝者空间的中介化记忆生产[J]. 未来传播, 2024, 31(4): 91-99.
- [36] BRUBAKER J R, HAYES G R, DOURISH P. Beyond the grave: Facebook as a site for the expansion of death and mourning[J]. Information Society, 2013, 29(3): 152-163.
- [37] 朱振. 逝者能够拥有权利吗? [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65 (01): 43-51+153.



## The Multi-Party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dentity in Online Mourning: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Zheng pinxi

**Abstract:** The affordances of networked media lead users to leave abundant digital traces across the internet. Through users' active behaviors, these traces converge to form their digital identities in cyberspace, reflecting the control of the "self" over its "avatar." However, when the subjectivity of digital identity is ab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at identity ceases to be directed by the "self." Based on this, our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identity in the absence of the subject, specifically that of the deceased.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combined with grounded theory, we find that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online mourning is itself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avatar of the deceased. This process is driven synergistically by four types of actors: media representation acts as the initial catalyst, sparking broad social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Subsequently, participation by netizens, involvement by relatives, and the deceased's prior digital self-presentation collectively contribute not only to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online mourning but also to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 consensus regarding the deceased's digital identity.

**Key words:** Online mourning; Digital identity; Digital traces; Self-presentation

### 作者简介 (ID):

郑平熹，男，新闻与传播硕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科研助理，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1900号，201600，xixizi0012@163.com